

热点聚焦

走中国特色区域协调发展道路

□ 魏后凯

区域差异大、发展不平衡是我国的基本国情。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任务。改革开放以来，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我国已经逐步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区域协调发展之路：一是对区域发展道路进行顶层设计；二是实行多层次的区域发展战略；三是实行分类管理的差别化区域政策。这条多元化、渐进式的区域协调发展道路，有力地推动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进而有力支撑了整体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各地发展基础和条件各异，协调区域发展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改革开放以来，在对国内外经验教训进行认真总结的基础上，我国从自身的国情出发，采取了依靠梯度推进方式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路径，并且较好地实现了由早期的不平衡发展到随后的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转变。实现这种由不平衡发展到协调发展的战略转变，虽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但成效显著。它不仅推动我国经济实现多年的高速增长，而且促进了各地区经济普遍发展，地区发展差距已经开始全方位缩小。可以说，经过长期不懈的积极努力，我国已经逐步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区域协调发展之路。

这一中国特色区域协调发展之路，具有三个重要特征：一是对区域发展道路进行顶层设计。二是实行多层次的区域发展战略，从不同层面共同推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三是实行分类管理的差别化区域政策。针对不同的经济功能区、主体功能区和特殊类型区，实行分类管理的差别化区域政策，既较好地体现了区别对待、分类指导的原则，又有利于提高政策的实施效果。

分析起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之所以能够取得显著成效，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宝贵经验：一是党和政府一贯高度重视区域协调发展，并把它作为应长期坚持的基本方针，保持政策的延续性和稳定性；二是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调动全社会资源，组织开展对口支援和扶贫工作等，为区域协调发展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障；三是发挥财政、金融、产业、区域等经济政策的协同作用，推动地区间要素合理流动和均衡配置，促进各地区分工和协调发展；四是加大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等转移支付力度，区域政策的目标逐步从早期的注重效率向更加注重公平转变；五是通过制定实施不同层次的区域性规划，设立各种类型的经济功能区，充分调动各地积极性，积极培育发展新动能和新增长极。

1 对区域协调发展道路的顶层设计

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曾

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出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上世纪80年代，邓小平同志又提出了以东部支持西部、先富帮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两个大局”战略构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区域经济的发展基本上是按照这一构想有序推进的。从重点支持发展条件较好的东部地区率先发展，到提出了区域协调发展的总方针，再到先后实施西部大开发、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促进中部崛起战略，同时加大了对贫困地区、革命老区、少数民族地区等的支持力度，由此改变了长期以来区域差距尤其是东西差距不断扩大的局面，促使区域经济逐步向协调发展的方向转变。可以说，“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和“两个大局”构想既是中国特色区域协调发展道路的重要理论基础，也是其顶层设计。从区域经济发展的角度看，这一构想就是设想通过“先富后富”这样一种梯度推进方式或者非均衡增长的途径，来实现各地区“共同富裕”、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这样一个长远发展目。

需要指出的是，随着发展观念的变化，人们对区域协调发展的理解也在不断深化。最初，人们往往从平衡发展或空间均衡的角度来理解区域协调发展。但这种单纯从生产或产出角度的考察，具有较大的局限性。因为在市场经济中，经济生产和产业活动分布本身就是空间不均衡的。有鉴于此，后来人们逐步把着眼点扩大到社会发展、生态环境和人的全面发展等方面。当前，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不单纯是强调经济的协调发展，追求经济发展差距的缩小，而是强调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是兼顾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有机融合的可持续协调发展。

2 构建多层次的区域发展战略体系

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针对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先后制定了以“四大板块”为地理单元、各有侧重的区域发展战略，这就是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东部率先的区域发展

总体战略。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的有效实施和不断完善，有力地推动了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在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的基础上，近年来国家又推动实施了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一带一路”建设三大战略，由此形成了“四大板块+三大战略”的区域发展战略体系。在这一区域发展战略体系中，“四大板块”战略是全覆盖的，是从国家战略层面对全国区域协调发展的统筹安排和总体部署；而三大战略聚焦国际国内合作和协同发展，它在区域发展战略体系中起着引领、支撑和桥梁的作用。实行“四大板块”与三大战略相结合，将会产生叠加效应、协同效应和融合效应，这将激发区域发展的内生活力，推动形成一批新的增长点、增长极和经济轴带，由此拓展经济发展的新空间，提高我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

在“四大板块+三大战略”的基础上，党的十九大报告又明确提出，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并将加大

力度支持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加快发展，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

调发展的城镇格局以及支持资源型

地区经济转型发展等内容纳入进来，由此进一步丰富了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内涵，逐步形成了多层次的区域发展战略体系。《全国国土规划纲要（2016—2030年）》明确提出构建多中心网络型开发格局，力争

到2030年，城市化战略格局进一步完善，重要轴带开发集聚能力大幅提

升，多中心网络型国土空间开

发新格局基本形成”。这种多中心

网络型国土空间开发新格局的形

成，将会有力地推动我国经济的适

度空间均衡和区域经济的全面协

调发展，从而为实现高质量发展奠定

坚实的基础。

3 实行分类管理的差别化区域政策

我国国土面积辽阔，地区差异较大，各地区的自然条件和经济社会特点千差万别。无论是国家宏观调控还是区域政策制定，如果忽视这种地域差异性，单纯采取“一刀切”的办法，再好的政策也难以取得较好的效果。为避免“一刀切”现象，切实提高政策的有效性、精准性和可持续性，我国在40年改

革开放实践中，逐步探索出了按照

经济功能区、主体功能区和特殊类型区等，实行分类管理的差别化区域政策。

一是针对经济功能区的优惠政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先后设立了一大批不同类型的经济功能区，从早期的经济特区、沿海经济开放区、经济技术开发区等，到随后的保税港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自主创新示范区、自由贸易试验区等，国家在赋予其明确的功能定位基础上，均给予了相应的优惠政策，支持这些地区加快开放开发，全面深化改革。各种经济功能区布局从沿海向内陆地区的有序推进，加快了区域协调发展的进程。

二是针对主体功能区的调控政策。自2005年以来，我国积极推进主体功能区的规划建设。2010年12月，国务院颁布了《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按照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现有开发密度和发展潜力，将国土空间划分为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四类主体功能区，以规范空间开发秩序，优化空间结构，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对于不同类型的主体功能区，国家明确了其主体功能定位和发展导向，并在财政、投资、人口、环境等方面实行分类管理的区域政策，建立各有侧重的差别化绩效考核评价办法，推动形成人口、经济、资源环境相协调的国土空间开发格局。

三是针对特殊类型的援助政策。从国际经验看，各国的区域政策大都针对各类问题区域展开。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采取一系列举措，推动贫困地区脱贫攻坚，支持革命老区开发建设，促进民族地区健康发展，推进边疆地区开发开放，老少边穷地区面貌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

从发展的角度看，随着发展阶段和经济形势的变化，区域政策也应当进行相应调整和优化。一方面，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全方位开放格局的形成，国家对各类经济功能区的优惠政策应逐步弱化，今后重点是鼓励其进行体制机制创新，实现高质量发展。另一方面，区域援助政策应主要针对关键问题区域展开，切实帮助各种问题区域解决发展中面临的困难，增强其自我发展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从而更好推动整体区域协调发展。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理论在线

加快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一流企业

□ 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

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具有竞争力强、市场价值大、社会影响力广等特征。加快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有利于推动国家技术进步、拉动产业升级、提升劳动者素质。

现代经济体系中，企业是发展经济、创造财富、扩大就业的主体，对于我国来说，企业还在推动工业化和城镇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的重要经济支撑。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准确认识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在开放经济环境中的作用，特别是其在推动国家技术进步、带动产业链转型升级及提升劳动者素质等方面的作用，对于我国进一步深化改革、建设现代经济体系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其一，有利于整合全球资源推动国家技术进步。在市场经济中，企业以多赢和共赢思维去处理各种技术相关的产权问题，并通过将技术转化为新的商品和服务来开拓新的利润来源，从而形成技术持续进步的机制，成为国家技术进步的微观基础。

从历史及实践上看，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企业在各自领域有长期的技术积淀，能够整合不同国家、不同区域的人才共同开发先进的技术产品，有雄厚的资金支撑巨大的研发投入，并且通过对高科技中小企业的并购迅速将技术商品化，从而形成了持续推动企业技术进步和竞争力提升的重要力量。同时，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在技术进步、产业融合中不断地“裂变”和“聚变”，从而使其实现的研

究理念、技术标准、工艺水平不断地向其他企业溢出和传递，共同推动了国家的技术进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批本土企业在国际竞争中脱颖而出，他们制订了人才国际化、资金国际化、生产国际化、市场国际化的发展战略，通过在全球筹集研发资金和分摊研发成本，不断提升竞争能力，为国家的技术进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当前，全球科技创新迅猛发展，新技术转化为生产力和经济效益的周期大大缩短，我们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就要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建立健全创新体制机制，下大力气尽快培育一批能够支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引领未来科技变革方向、参与国际竞争合作的世界一流企业。

其二，有利于带动产业链中关联企业转型升级。市场经济中大量的企业在开拓业务过程中不断凝聚核心竞争优势、不断拓展商业联系，从而形成广泛协作的、网络化的社会化生

产结构。对于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来说，和大量的关联企业形成同步研发、同步生产、同步销售的协作关系有助于缩短产品的开发周期，是共同提升全球竞争力的重要措施。在全球化大背景下，世界一流企业往往把掌控产业链中技术含量高、增值幅度大、带动性强的重点环节作为战略发展重点，在整个产业链中往往处于核心和支配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说，在社会化大生产中，拥有世界竞争力的一流企业可以通过订单约束和规范上下游产业链中的关联企业，带动其提高技术水平、管理能力、物流速度，从而形成具有正反馈的产业链或生态体系，层层拉动上下游企业实现转型升级。

其三，有利于培养与社会化大生产相适应的现代化劳动者。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是现代化大生产体系中的重要节点，其在产品开发、生产管理、成本控制、物流速度等方面都有着深刻独到的理解，并形成丰富的方法和工具来实现这些目标。一流企业在不断发展过程中，既通过相关体制机制集聚优秀的人才队伍，同时其严格的生产实践以及复杂的生产协作亦有利于培养与社会化大生产相适应的具有追求卓越、精益求精等工匠精神的现代化的劳动者，带动相关劳动者的素质的提升。

总之，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具有竞争力强、市场价值大、国际化水平高、社会影响力广等特征，是国家和地区之间竞争的重要力量，其在推动国家技术进步、拉动产业升级、提高从业人员技能及收入水平上发挥着重要作用。“凡益之道，与时偕行”。目前，我国经济长期稳定持续发展所形成的巨大的市场空间、完整的产业链体系、充沛的生产要素供应仍然是我国产生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的沃土。未来，我们要加大改革力度，在切实降低企业成本、积极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下更多功夫，加快形成一批在国际资源配置中能够占据主导地位的领军企业，培育一批引领全球行业技术发展的领军企业，培育一批在全球产业发展中具有话语权和影响力的领军企业，从而培育更多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执笔：尚会永 刘峰）

本版编辑 欧阳优

改革方法论创新无止境

□ 中央党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

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色，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惟改革者进，惟创新者强，惟改革创新者胜”。改革永无止境，改革方法论的创新和发展也永无止境。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过程中，方法决定做法，做法决定成败，我们要学好用好改革方法论，不断与时俱进，推动方法升级、做法创新，不断把改革推向深入。

学术经纬

方法决定做法，方法不一样，做法也就不一样；只有把方法搞对头，改革才不会走弯路，做法才能搞对头。做法决定成败，正确的改革策略将改革导向成功，错误的改革策略必然导致改革失败。改革方法不是一成不变的，改革策略也不是一劳永逸的。随着改革实践的深化，方法需要升级换代，做法也要发展创新。

方法决定做法

改革方法论是指导改革工作的基本遵循。改革的方法与做法不是一个东西，方法是改革的理性工具，做法是改革的具体政策和策略；方法是理论层面的，做法是操作层面的。

改革的做法千万种，但做法的取舍取决于对某种方法的认同和选择。有什么样的方法，就会有什么样的

做法。比如，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告诉我们，改革必须从问题出发，从实际出发，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以问题为牵引的改革导向，改革政策和策略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告诉我们，改革务必发扬实践第一的精神，坚持实践标准，拿事实来说话；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告诉我们，改革必须遵循从不知到知、从知之不多到知之较多、从熟知到真知的认识规律，坚持从易到难、循序渐进的改革策略；矛盾分析方法告诉我们，改革既要“抓住重点”“突出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又要“十个指头弹钢琴”；历史主义方法告诉我们，改革不能割断历史，“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利益分析方法告诉我们，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

做法决定成败

什么样的做法导致什么样的结果。改革的结果无非两种：成功与失败。适应现实情况、符合时代发展要求、遵循客观规律的改革策略有利于推进改革行稳致远；无视具体情况、不符合历史逻辑、违背客观规律的改革策略则可能误导改革，甚至犯颠覆性的错误。这在世界历史上是有惨痛教训的。

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运动

中，我们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我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迎来了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发生的变化是人类历史上一场伟大的经济和社会变革。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7年中国GDP总量为827122亿元，首次登上80万亿元的门槛；中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多年稳定在30%左右，是拉动世界经济的第一引擎；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工业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中国是全球减贫脱贫事业的典范，现行联合国标准下的7亿多贫困人口成功脱贫，占同期全球减贫人口总数70%以上。中国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改革开放，归功于正确的改革方法、改革路线、改革方针和改革策略。

历史是一面镜子，可以照见过去，也可以照亮未来。中国的改革方

兴未艾，正确的改革方法、改革策略造就了一个民族的辉煌与腾飞，中国踏上了民族复兴的壮丽征程。

方法做法要与时俱进

时代在发展，方法和做法也要与时俱进。世间万物，变是唯一的不变，时代亦然。不同的时代，改革的对象、要求是不尽相同的，改革的力度、广度、深度、难度也是不一样的，改革的方法和做法不能拘泥于特定时代的约束，而是要与时代发展同进步。

与时俱进是实践发展的客观要求。实践发展永无止境，改革开放也永无止境。随着实践的发展，改革所达到的层面，改革所面临的问题，都会随之而改变。那么，这就需要创新改革的政策和策略，倒逼改革方法论的创新和升级。

与时俱进是实践发展的客观要求。实践发展永无止境，改革开放也永无止境。随着实践的发展，改革所达到的层面，改革所面临的问题，都会随之而改变。那么，这就需要创新改革的政策和策略，倒逼改革方法论的创新和升级。

中国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已经从一个封闭半封闭的计划经济国家转变为一个全方位开放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从一个饱受贫困困扰的国家转变为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发展中大国。同时，中国的改革已经从“人人叫好”的“浅水区”进入“利益博弈”的“深水区”。改革的环境和改革所面临的问题今非昔比。如今，我们“啃

的是硬骨头”“涉的是大险滩”，各种利益相互纠葛，各种矛盾错综复杂，新旧任务交织叠加。这个时候更加需要有新的改革思维、新的改革策略和新的改革办法。比如，过去突出强调“摸着石头过河”，今天则进一步强调“加强顶层设计”；过去强调“胆子要大、步子要稳”，今天则进一步强调“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过去强调“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今天则进一步强调“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去强调“市场的基础性作用”，今天则进一步强调“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过去强调“不争论”“不折腾”，今天则进一步强调“一部部署，九分落实”；过去强调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今天则进一步强调“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无不体现改革方法论和改革策略的与时俱进。

总之，改革方法论既源于改革，又指导改革。方法论改革既缘于改革的深化，又进一步推动改革的深化。改革每向前推进一步，方法论便完善一步。改革实践永无止境，改革方法论的创新和发展也永无止境。（执笔：陈曙光 刘小莉）